

论宋体四六的功能与价值

沈松勤

内容提要 在变革骈俪形态的四六中，欧阳修等人“以文为骈”，运以散体之法，以说理达意为宗旨，在“古体”与“唐体”以外创立“宋体”。宋体四六虽有失“四字六字律令”固有的和谐美，却别具一种格调，在宋代士人多层面的文化生活中，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，呈现出纪事存史、抒情言志等多种功能与价值。其功能与价值虽根植于应用，却具有不可忽视的文体学与文学史意义。

关键词 古文运动 以文为骈 宋体四六 功能与价值

一 问题的提出

长期以来，学界过于强调四六与古文的对立，也往往否定四六的功能与价值，甚至认为自韩愈以后，四六“受了古文作家们最大的攻击，以至于销声匿迹”^①；而四六为“言之无物”的“颓废”文体，则也成了“盖棺论定”，被写入《辞海》的有关条目。因而宋四六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，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忽视了。对此，近来学界虽有所纠正，但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。

以往学界对宋四六的否定性评价，无疑出于对北宋古文运动的片面认识，也与当年石介等人反四六的思想不无关系。北宋古文运动承担了在思想领域复兴儒学、在文学领域变革文体的双重任务；为了排斥佛老，复兴儒学，石介等人大力提倡古文，摈弃四六。然而，难道四六真的像石介所说的是“淫巧浮伪之言”，破碎了儒家之“道”^②，而唯有古文才能振兴儒学？作为文体范畴的四六、古文与作为思想领域的佛老、儒学之间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吗？

现存中唐陆贽《翰苑集》，无论制诰抑或奏议，敷言则俪，均为四六；其四六虽出于声律对偶，但敷陈论列，无往不可，而且每每曲尽事情，词婉理胜。元祐八年五月，苏轼与吕希哲、吴安诗等人联名上书，称陆贽之文“深切于事情”而“不离于道德”，乃“聚古今之精英，实治乱之龟鉴”，“反复熟读，如与贽言，必能发圣性之高明，成治功于岁月”^③。这表明四六与古文同样具有明道治世的功能与价值。

晚唐以后，骈文又称四六，是与古文相对的一个概念。古文追求奇句单行，四六讲究声律对偶，两者之间有散、韵之别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彼此如同井水与河水，各不相犯，尤其是在表现内容上，更不是楚河汉界，不可逾越。况且任何文体都要讲究艺术性。孔子说：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。”先秦古文至今不乏魅力，与其“言之有文”不无关系，即欧阳修所说：“君子之所学也，言以载事，而文以饰言，事信言文，乃能表见于后世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皆善载事而尤文者，故其传尤远。”^④

① 郑振铎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371页。

② 《徂徕石先生文集》卷五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，第63页。

③ 《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》，《苏轼文集》卷三六，中华书局1979年版，第1012—1013页。

④ 《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》，曾枣庄等编《全宋文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33册，第78—80页。

盛行于六朝的骈文原本属于讲究艺术性的一种美文样式，王国维将它与楚辞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誉为“一代之文学”^①，但流行既久，渐现堆积典实、浮华靡丽之弊，有伤文章之真美。韩愈倡导古文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在于四六“绣绘雕琢”^②，妨碍了内容的表达，但他对骈文在艺术上的优长仍加以吸收，故其文“备尽时体（四六）”^③。北宋古文运动最终取得成功的标志是继承了韩愈文道并举之业，既在士林复兴了儒学，又在张扬古文的同时，变革了骈文，创立了宋体四六，使古文与四六在文坛分疆而治。

本文将讨论宋体四六的特征及其功能与价值，旨在昭示其在宋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。

二 “以文为骈”与宋体四六

陈师道说：“国初士大夫例能四六，然用散语与故事尔。杨文公刀笔豪赡，体亦多变，而不脱唐末与五代之气，又喜用古语，以切对为工，乃进士赋体尔。欧阳少师始以文体为对属，又善叙事，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，次退之云。”^④陈善也说：“以文体为诗，自退之始；以文体为四六，自欧公始。”^⑤明人又将四六分为“古体”、“唐体”、“宋体”^⑥，用来区分它们之间的不同特征。宋体四六特征的形成，正始于欧阳修“以文为骈”的文体革新。

不过，欧阳修四六创作有个前后变化的过程。吴子良说：“欧公本工时文，早年所为四六见别集，皆排比而绮靡，自为古文后，方一洗去，遂与初作迥然不同。”^⑦欧阳修始“为古文”，大约在天圣九年以后^⑧。在此以前，其四六如《上胥学士启》、《谢国学解元启》等，皆句句用典，句自为对，对偶工整，基本不失唐人矩矱；在此以后，“以文为骈”，“而骈体亦一变其格，始以排鼻古雅，争胜古人……于是六朝三唐格调浸远”^⑨，宋体四六始告确立，“学之者益以众多”^⑩。“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，委曲精尽，不减古文。”^⑪尤其是苏轼，直承欧阳修专务以气行的创作精神，人称欧、苏四六“只是一篇古文”^⑫。欧阳修之后，不仅名家辈出，而且蔚然成派。“荆公谨守法度，东坡雄深浩博，出于准绳之外。由是分为两派。近时汪浮溪、周益公诸人类荆公；孙仲益、杨诚斋诸人类东坡。”^⑬而两派实为欧阳修之羽翼，都在“以文为骈”中，体现了宋体四六的格调。

那么，欧阳修怎样“以文为骈”？宋体四六的格调又表现何在？不妨先看欧阳修《上随州钱相公启》：

相公坐于雅俗，镇以无为。民丰四辅之年，市息三九之盗。行郊憩树，绝无两造之辞；托乘载宾，惟奉百金之宴。而况西河幕府，最盛于文章；南国兰台，莫非乎英俊。岂伊末迹，首玷初筵？至于怜嵇懒之无能，容祢狂而不辱。告休漳浦，许淹卧以弥旬；偶造习家，或忘归而终日。但觉

① 《宋元戏曲史》，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101页。

② 《上宰相书》，马其昶《韩昌黎文集校注》卷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157页。

③ 叶适《习学记言》卷四九《皇朝文鉴三》，中华书局1977年版，第733页。

④ 《后山诗话》，何文焕辑《历代诗话》，中华书局1981年版，第310页。

⑤ 《扞虱新话》上集卷一“文体”条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310册，第7页。

⑥ 见贺复徵编《文章辨体汇选》卷一二五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403册，第440页；陈懋仁注梁任昉《文章缘起》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2625册，第4页。

⑦ 《荆溪林下偶谈》卷二，《丛书集成新编》第12册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，第526页。

⑧ 欧阳修《记旧本韩文后》谓该年为洛阳推官后，始与钱惟演、尹洙等人“作为古文”（《全宋文》第34册，第86页）。

⑨ 孙梅《四六丛话》卷三三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715册，第602页。

⑩ 谢伋《〈四六谈麈〉自序》，《全宋文》第190册，第335页。

⑪ 欧阳修《试笔·苏氏四六》，《全宋文》第35册，第199页。

⑫ 谢采伯《密斋笔记》卷三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2872册，第32页。

⑬ 杨因道《云庄四六余话》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2617册，第30页。

从军之乐，岂知为吏之劳？^①

明道二年（1033）十二月，钱惟演自洛阳贬任崇信郡节度使，居随州。该启作于此时。欧阳修于天圣八年（1030）进士，次年为洛阳推官，始与钱惟演、尹洙等作古文；也就是说，这是欧阳修四六创作“一变其格”的初始期，《上随州钱相公启》为其中的一篇。全文共三段，上列为第一段，回忆在洛阳钱惟演幕府中的生活。就其声律对偶、使事运典而言，看似与传统的四六并无多大差别，但通篇以达意为主，而且其叙事达意，流转自然，无艰难牵强之态，使事用辞，不尚藻丽，无错丛磔裂之迹；同时在体格形态上，主要出于合两句为一联的双句对，亦称“隔句对”。这也是以下两段的主要形态。如第二段写钱氏离洛后的冷落无依的心情：“稍以引去，无复并游之人；岿然自存，时有思归之叹”；第三段规劝钱氏达观处世，静待复出：“系辞有云，崇高莫大乎富贵；古人叹曰，富贵必履于危机。……秉珪璋之德，何恤瑕疵；挺松筠之心，不变霜雪。虽流路之谤，未免三年以居东；而在廷之臣，岂无一言之悟主。”由此等等，均为隔句对。叙事达意，不尚藻丽，固然是欧阳修自觉变革昆体末流错丛磔裂之弊的表现，通篇主要出于四、五、六、七言等参差不一的句式组成隔句对，也即陈师道所谓“以文体为对属”，则是在变革以往四六中形成的新的体格形态。该体格形态就是陈振孙在总结欧阳修、苏轼四六“变唐体”后的特征时所说的“以博学富文，为大篇长句”^②。众所周知，以往骈文主要以四字、六字为句，句自为对，较少有合两句为一联，更无大篇长句，但这却成为欧阳修、苏轼等众多作家创作的常式，而且在他们的笔下，又不乏三句或三句以上相对的偶俪形态。这种大篇“以文体为对属”的体格形态，较诸句自为对的“四字六字律令”，既别具一派上坠下抗、潜气内转的偶俪神韵，又犹如驰骋如意、气疏以达的“一篇古文”，明显具有了散体的格调，堪称骈文中的古文。从中也不难看出，欧阳修等人在四六创作中，已自觉运用散体之法，“以文体为对属”，故多大篇长句。

运用散体之法，是欧阳修“以文为骈”的主要方式，以“文体为对属”，则是其运用散体之法的具体手段。由此产生的四六，也就自然离“六朝三唐格调浸远”了。而这种“以文为骈”的创作方式和手段，是欧阳修等古文家在多元创作实践中形成的，尤其值得注意的，是他们既非古文又非四六的创作。

在古文创作中，欧阳修常常以骈入散，使“散句与骈句水乳交融而灵活变化，极大地增强了表现力”^③，因而又创作了既非古文又非四六的作品，如其脍炙人口的《醉翁亭记》，似骈似散，在文体范畴上，至今尚无归属。全文以“也”字表示一个完整的句意，每一个完整的句意往往出于骈偶形式。如“朝而往，暮而归”，为三字句式的单句对；“负者歌于涂，行者休于树”，为五字句式的单句对；“日出而林霏开，云归而岩穴暝”，为六字句式的单句对；“临溪而渔，溪深而鱼肥；酿泉为酒，泉香而酒冽”，则为四、五字句式的隔句对。在每一个完整的句意之间，有的如“夕阳在山，人影散乱，太守归而宾客从也；树林阴翳，鸣声上下，游人去而禽鸟乐也”，在句式上，前后相对，以三句对构成一联，在用意上，前后相映，以鸟乐映衬归时心中之乐，句式与句意均相对偶；有的如“日出而林霏开，云归而岩穴暝，晦明变化者，山间之朝暮也；野芳发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阴，风霜高洁，水落而石出者，山间之四时也”，以时空对时空，展示山间朝暮四时的变化，前后句意相偶，但其句式骈散相间，并在描写山间四时变化中秋天景色的“风霜高洁，水落而石出”中，故意加一“而”字，以破本来整齐的偶俪句式。这进一步表明了欧阳修有意识地以散体之法，组织全文的骈偶成分。不过，《醉翁亭记》无论是在以散体之法变革四六中形成的新体骈文，抑或是在以骈入散中创造的新体古文，这种无法严格归类的文体，一方面为欧阳修及后来作家所常用，如欧阳修《丰乐亭记》、《真州东园记》，苏轼前后《赤壁赋》、《超然台记》，苏辙《黄州快哉亭记》、《武昌九曲亭记》等不少名篇，都介于骈散之间；另一方面该文体的出现，并非是偶然或孤立的现象，而是欧阳修等古文家在以骈入散和“以文为骈”的文体

① 《全宋文》第33册，第127页。

② 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一八《浮溪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526页。

③ 王水照《欧阳修学古文于尹洙辨》，《王水照自选集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460—462页。

革新中油然而生的，它紧紧维系着北宋古文的发展与四六的新变，其当下意义在于：既丰富了古文的艺术表现力，又拓展了“以文为骈”的创作方式，推进了宋体四六的格调生成。

创始于欧阳修的“以文为骈”，在冲破“四字六字律令”的体制，变革昆体末流错丛磔裂之弊的同时，赋予了传统四六新的格调与生命，使之既笔文互现，不失辞采，又理无不畅，意无不达。朱熹说：“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，只是平易说道理，初不曾使差异的字换却那寻常的字。”又说：“文字到欧、曾、苏，道理到二程，方是畅。”^①所谓以“寻常的字”“说道理”而道理无不畅，就是指欧、苏等人为文，运辞必畅，叙事必举，体现了以说理达意为上的创作宗旨。朱熹所指欧阳修、曾巩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的平易畅达之文，就包括了四六。欧、曾、苏诸家及王安石在倡导古文，变革四六中，都进行了以骈入散和“以文为骈”的创作实践，所以他们的古文与四六异曲同工，格调相通，即吴子良所说：自欧阳修以后，“盖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也。然二苏四六尚议论，有气焰，而荆公则以辞趣典雅为主，能兼之者，欧公耳”^②。

欧阳修四六以说理达意为上，条畅流转，词藻色泽趋于平淡。脱胎于欧阳修的苏轼四六，叙事达意虽也条畅流转，但又别具一格，在体制上更“出于准绳之外”。如其《谢制科启》（二）：

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，故舍其平生，而论其一日；通变者恐人才之未尽，故详于采听，而略于临时。兹二者之相形，顾两全而未有。一之于考试，而掩之于仓卒，所以为无私也，然而才行之迹，无由而深知；委之于察举，而要之于久长，所以为无失也，然而请属之风，或因而滋长。此隋唐进士之所以为有弊，魏晋中正之所以为多奸。^③

全文以“寻常的字”论进士科与制科兼举的合理性，此段陈说偏用进士科之失。“用法者”一联长达六句三十八字；“一之于考试”一联竟达十句五十六字；“隋唐进士”一联，虽句自为对，却出于十字句式。又如《谢韩舍人启》：“有司推恩而求名，则侵君之权；天子执法而责实，则失民之望。为君者常病于察，为臣者又失之宽。古之明天子，信其臣而不惑于多言，故有司执法而无所忌；古之良有司，忧其君而不恤于私计，故天下归怨而不敢辞。”^④诸如此类，一片散行，议论风生。其议论说理，言随理行，常行于所当行，文随意止，止于所不可不止，在以散体之法组织的大篇长句中，形成了一派恣肆排荡之势，体现了特有的散体格调。当然，在体制形态上，苏轼四六并非都是如此，他在任职翰林与知制诰时所作的内外制，却对属工丽，典赡高华，但同样“有气焰”。如《除吕公著特授守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加食邑实封余如故制》云：“既得天下之大老，彼将安归；以至国人皆曰贤，夫然后用。”^⑤运用经语，工整贴切，又如同己出，叶梦得称此“气象雄杰，格律超然”^⑥。王铨说：苏轼“《谢对衣金带马表》略曰：‘物生有待，天地无穷。草木何知，冒庆云之渥采；鱼虾至陋，借沧海之荣光。虽若可观，终非其有。’四六至此，涵造化妙旨矣”^⑦。所谓“涵造化妙旨”，即指以气运典，典与意会，既极精致工切，又极排荡灵动。孙梅说：“东坡四六，工丽绝伦中，笔力矫变，有意摆落隋唐五季蹊径。以四六观之，则独辟异境，以古文观之，则故是本色，所以奇也。”^⑧所言颇为中肯。

王安石四六同样胎息于欧阳修，也有像苏轼那样尽显“古文本色”之作，如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，通篇议论说理，也通篇“以文体为对属”。谢伋认为“四六施于制诰表奏文檄，本以便于宣读，多以四

① 黎靖德编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三九《论文上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3309页。

② 《荆溪林下偶谈》卷二，《丛书集成新编》第12册，第526页。

③ 《苏轼文集》卷四六，第1323页。

④ 《苏轼文集》卷四六，第1339页。

⑤ 《苏轼文集》卷三八，第1094页。

⑥ 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卷上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2786册，第32页。

⑦ 《四六话》卷上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2615册，第3页。

⑧ 《四六丛话》卷三三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715册，第608页。

字六字为句。宣和间，多用全文长句为对，习尚之久，至今未能全变，前辈无此体也。”^①其实，此体在王安石笔下早已初露端倪。但最能代表王安石四六风格的是那部分“谨守法度”之作。如《手诏令视事谢表》，全文从君臣初遇，孤身许国到不胜招怨纳毁，决意退藏保身，犹如一幅线条洗练、意境深邃的大写意，将入相以来的艰难时事，以及希望与失望交错、了悟与悲愤杂存的复杂心境，呈现在读者面前。辞趣典雅，却言约意赅，笔力峭劲，一股简严精悍之气溢于言表；就表现形态而言，也“以文体为对属”，且多隔句对，其声韵偶对却极为工稳，结构剪裁也极为矜持，在“以文为骈”中，又体现出严谨的法度。

欧阳修在“以文为骈”中“平易说道理”，四六的体制与格调为之一变，而脱胎于欧阳修的王安石与苏轼四六，则前者举义理于简严精悍之中，后者藏曲折于恣肆排荡之中，发展了宋体四六的格调，也丰富了宋体四六的表现风格。后来的四六创作，基本不出这三家范围。宋人论四六也常以三家为准则，如：“水心与笱窗论四六，笱窗云：‘欧做得五六分，苏四五分，王三分。’水心笑曰：‘欧更与饶一两分可也。’水心见笱窗四六数篇……深叹赏之：‘盖理趣深而光焰长，以文人之华藻，立儒者之典刑，合欧、苏、王为一家者也。’”^②被认为辨“四六之源流正变”“深为有功”^③的王志坚《四六法海》，所选两宋四六数量最多的，就是欧、王、苏三家，几占入选宋四六的三分之一，这又从选学的角度揭示了三家在宋体四六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与地位。

不过，王志坚《四六法海》所选南朝至宋元四六，极大部分是宋以前的作品，两宋四六的数量很小，其因在于“四六与诗相似，唐以前作者，韵动声中，神流象外，自宋而后，必求议论之工，证据之确，所以去古渐远”^④。“去古渐远”作为宋体四六的弊端，也常为其他学者所诟病。楼钥便指出，四六“本以文从字顺，便于宣读，而一联或至数十言，识者不以为善也”^⑤。孙梅在肯定汪藻四六“可称精切，南宋作者未能或先”的同时，又认为其成就不能与唐李商隐“同日而语”，因为“古之四六，句自为对，语简而笔劲，故与古文未远。其合两句为一联者，谓之隔句对，古人慎用之，非以此见长也。故义山之文，隔句不过通篇一二见，若浮溪非隔句不能警矣，甚或长联至数句，长句至十数字者，以为裁对之巧。不知古意浸失，遂成习气，四六至此弊极矣”^⑥。然而，这种“弊端”与宋代诗人继承韩愈的“以文为诗”而创成自具特色的“宋调”相同，是宋四六作家为“求议论之工”而“以文为骈”所致；换言之，始于欧阳修的“以文为骈”，虽赋予了四六散文化的特点，有失“四字六字律令”固有的和谐美，但以说理达意为上，用词清新，气韵生动，别具一种格调，有类“宋人之诗变化于唐，而出其所自得，皮毛落尽，精神独存”^⑦。宋体四六之所以能自立，也正在于此。

三 宋体四六的功能与价值

正如洪迈所说：“四六骈俪，于文章家为至浅，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，无所不用。”^⑧清四库馆臣也指出：“至宋而岁时通候、仕宦迁除、吉凶庆吊，无一事不用启，无一人不用启，

① 《四六谈麈》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2615册，第1页。

② 《荆溪林下偶谈》卷二，《丛书集成新编》第12册，第526页。

③ 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八九《四六法海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1719页。

④ 王志坚《四六法海序》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394册，第297页。

⑤ 《北海先生文集序》，《全宋文》第264册，第103页。

⑥ 《四六丛话》卷三三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715册，第615页。

⑦ 吴之振《宋诗钞序》，《宋诗钞》卷首，商务印书馆《国学基本丛书》本，第1页。

⑧ 《容斋随笔·三笔》卷八“四六名对”条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505页。

其启必以四六，遂于四六之内，别有专门。”^①四六成了宋代士人在多种生活领域中须臾不能离去的一种文体，以至成为专门之学，出现了如王铨的《四六话》、谢伋的《四六谈麈》、杨困道的《云庄四六余话》等四六专论。所以宋人对本朝四六作品颇为珍视，据曾枣庄先生统计，吕祖谦《宋文鉴》所选各种四六作品约占文的三分之一，在齐贤、叶棻合编的《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》中，四六竟达三分之二^②。究其原因，四六作为他们多层面文化生活的一种载体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具有不可忽视的功能与价值。

从运用范围观之，宋四六大致可以分为公用——“朝廷命令诏册”与私用——“缙绅之间笺书祝疏”两类，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观之，前者为代言，后者为自言。两者虽都追求“议论之工”，但由于运用范围有异，其功能与价值却各有侧重。

（一）代言体的纪事存史功能

孙觌在总结汪藻四六创作与影响时说：“以儒先宿学，当大典册，秉太史笔，为天子视草，始大发于文。深醇雅健，追配前作，学士大夫传诵，自海隅万里之远，莫不家有其书。”^③如其《皇太后告天下手书》：

比以敌国兴师，都城失守。侵缠宫阙，既二帝之蒙尘；诬及宗祧，谓三灵之改卜。众恐中原之无统，姑令旧弼以临朝。虽义形于色，而以死为辞；然事迫于危，而非权莫济。内以拯黔首将亡之命，外以舒邻国见逼之威。遂成九庙之安，坐免一城之酷。乃以衰癯之质，起于闲废之中。迎置宫闱，进加位号。举钦圣已行之典，成靖康欲复之心。永言运数之屯，坐视邦家之覆，抚躬独在，流涕何从？缅惟艺祖之开基，实自高穹之眷命。历年二百，人不知兵；传序九君，世无失德。虽举族有北辕之衅，而敷天同左袒之心。乃眷贤王，越居近服。已徇群情之请，俾膺神器之归。繇康邸之旧藩，嗣我朝之大统。汉家之厄十世，宜光武之中兴；献公之子九人，惟重耳之尚在。兹为天意，夫岂人谋？尚期中外之协心，共定安危之至计。庶臻小愒，同底丕平。用敷告于多方，其深明于吾意。^④

题中“皇太后”即哲宗孟皇后，绍圣期间被废。靖康二年，金人攻占汴京，尽虏徽宗、钦宗二帝及六宫北上，并立宋臣张邦昌为傀儡，以实施其以华制华之策。张邦昌在迎置孟太后于宫闱的同时，欲迎立徽宗第九子赵构为君，自己却不便出面，故以孟太后的名义下诏；而孟太后则是被废之人，以其名义拥立君主，又名不正，言不顺。汪藻则以国家将亡之哀痛，抵御外敌之激情相鼓动，以“虽举族有北辕之衅”一联达其旨意，既适时又得体。首写京城失守，二帝蒙尘，国家处于危亡关头；次说虽“起于闲废”，却与国同悲，与祖同德，有与天“同左袒之心”；继而宣布赵构继位，实为天意，希望中外同心协力，共御外侮。通篇虽不过三百字，但包涵既多，又情深理切，情理圆融。作为对当时重大事件与时代精神的实录，该文成了珍贵的史料，为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、《宋史纪事本末》等正史所取；与此同时，作者在纪事存史的过程中，又文从字顺，文气通贯，体质浑然，特别是“汉家之厄十世”一联，古今比拟贴切，神情尤为悲壮，“读之感动，盖中兴之一助也”^⑤。可以说，其艺术感染力不让当时任何一首优秀作品专美于前。

汪藻四六在内容上多代言中兴大事，在艺术上又有“集大成者”^⑥之誉，所以出现了“学士大夫传诵，自海隅万里之远，莫不家有其书”的盛况。但综观两宋别集所载大量同样“秉太史笔”而作的“朝廷命令诏册”，大至实录各时期的重大事件，包括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学术等领域的走向，小至官员擢

① 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六三《四六标准》，第1396页。

② 《论宋代四六》，《唐宋文学研究》，巴蜀书社1999年版，第296页。

③ 《浮溪集序》，《全宋文》第160册，第309页。

④ 《全宋文》第156册，第404—405页。

⑤ 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丙编卷三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283页。

⑥ 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一八《浮溪集》，第526页。

降之命，以及对官员的褒扬与贬斥，都不乏佳构名篇，而不少名篇的纪事又比后世所撰正史更具真实性，苏轼《王安石赠太傅》就是一例，其中有云：

将有非常之大事，必生希世之异人。使其名高一时，学贯千载。智足以达其道，辩足以行其言。瑰玮之文，足以藻饰万物；卓绝之行，足以风动四方。用能于期岁之间，靡然变天下之俗。具官王安石，少学孔孟，晚师瞿聃。网罗六艺之遗文，断以己意；糠秕百家之陈迹，作新斯人。属熙宁之有为，冠群贤而首用。信任之笃，古今所无。方需功业之成，遽起山林之兴。浮云何有，脱屣如遗。屡争席于渔樵，不乱群于麋鹿。进退之美，雍容可观。^①

苏轼与王安石因政见相左，在熙丰变法期间冲突不已，终成政治上的劲敌。元祐元年，苏轼在代朝廷作这篇外制时，并没有因宿敌而有所贬损，对已故王安石的远大的政治理想、敢作敢为的政治品格，“瑰玮之文”的文学成就、“断以己意”的学术性格、“浮云何有”的高尚人格，秉笔直书，如同一幅形神兼备的人物素描，真实地描绘了王安石的形象。由于为南渡以后士林痛斥王安石的声音所左右，《宋史》的编撰者在《王安石传》中，肆意歪曲，刻意诋毁，为后世认识王安石设置了一层厚厚的迷雾，但终究掩盖不住苏轼这篇代言的真实性。而两者相较，在纪事存史中孰得孰失，不言而喻。

宋人称代言“朝廷命令诏册”者为“执法词臣”^②。意即他们在代言时，能“秉太史笔”，不虚美，不寄怨，所以在纪事存史上具有真实性和可信度，即便是奸佞当道时，也不乏秉笔直书者。如蔡崇礼《北海集》，“所撰诏命数百篇，文简意明，不私美，不寄怨，深得代言之体。今观是集所载内外诸制，大约明白晓畅，切中事情，颇与《浮溪集》体格相近。如《吕颐浩开督府制词》，则楼钥赏其宏伟；《王仲巖落职制词》，则王应麟取其精切；《邹浩追复待制制词》，则《宋史》采入本传，以为能推朝廷所以褒恤遗直之意；其草《秦桧罢政制》，则直著其恶”^③，体现了一位“执法词臣”应有的纪事职责与高超的文学水准。

四六作为“朝廷命令诏册”即诏制的唯一载体，在朝廷政治运作及士人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因此，尽管这是一种代言体，影响了作者自我思想的自由表达，但却具有其他文体所不具备的功能与价值。而在众多的代言者中，除了像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、苏轼、苏辙这样的文坛大家，王珪、范纯仁、汪藻、孙觌、蔡崇礼、洪适、程俱、张扩、周必大、杨万里等等，也都是为一时之选，为一代词臣冠冕，他们在“为天子视草”，深得代言之体的同时，均各自竭尽文学才能，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特征，也即晁公武论及曾巩四六制诰时所说：“所以本法意，原职守，为之训教者，人人不同，赡裕雅重，自成一家。”^④

（二）自言体的抒情言志功能

自言体四六，不仅是“缙绅之间笺书祝疏”，还包括了自陈情志的表、状、劄子等。现存欧阳修《居士集》，就收有《表奏书启四六集》七卷，共二百四十一篇，其中书启一百零一篇，表、状、劄子一百四十篇；而李刘《四六标准》四十卷所收奏议、书论、表启，则概为四六。这表明了宋人写作奏议，固然多用散体古文，但也继承了中唐陆贄遗风，有时出于韵文四六，其中又不乏影响深远之作。如王安石《本朝百年无事劄子》在陈说百年来所积弊端时说：

精神之运，有所不加；名实之间，有所不察。君子非不见贵，然小人亦得厕其间；正论非不见容，然邪说亦有时而用。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，而无学校养成之法；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，而无官司课试之方。监司无检察之人，守将非选择之吏。转徙之亟，既难于考绩；而游谈之众，因得以乱真。交私养望者，多得显官；独立营职者，或见排沮。故上下偷惰，取容而已。虽有能者，

① 《苏轼文集》卷三八，第1077页。

② 周必大《孙尚书鸿庆集序》，《全宋文》第230册，第149页。

③ 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五七《北海集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1355页。

④ 孙猛《郡斋读书志校证》卷一九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994—995页。

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。农民坏于繇役，而未尝特见救恤，又不为之设官，以修其水土之利；兵士杂于疲老，而未尝申敕训练，又不为之择将，而久其疆场之权。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，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；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，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。其于理财，大抵无法。故虽俭约，而民不富；虽忧勤，而国不强。^①

作为自仁宗后期以来士林变革声浪的最强音，王安石的这篇劄子高屋建瓴，势如破竹，揭开了熙宁变法的序幕，在政治实践中一扫近百年来的沉闷空气。上列所述即为熙宁变法的现实依据。为了论证变革的必要性，作者摄取了精神与名实、君子与小人、正论与邪说，以及学校、科举、吏制、士风、民生、兵制、宗室、财政等众多领域的弊端，既一一陈说，曲折殆尽件件事情，又洄洑逶迤，恳切如闻声声叹息，在“求议论之工，证据之确”中，洋溢着满腔“救时行道”的热情。唐人奏议出于骈体却又畅所欲言，略无板滞者，莫过于陆贽。宋人的骈体奏议也有不少堪与陆贽媲美，如孙覿四六“章疏制诰表奏，往往如陆敬舆，明辩骏发，每一篇出，世争传诵”^②。王安石《本朝百年无事劄子》，在内容上的深广程度和表现上的明辩骏发，则又超过了陆贽之作。

如前引王志坚语所云，传统“四六与诗相似”，“韵动声中，神流象外”，多吟咏情思，抒写性灵，陆贽却以骈体作奏议，陈说时事，议政言志，宋人承之，而且“必求议论之工，证据之确”，所以王氏所辑《四六法海》不收陆贽之文，又认为宋体四六“去古渐远”。这显然以陆贽及宋体四六为骈文中的别裁，但陆贽的别裁四六为宋人所重。苏轼、吕希哲、吴安诗等人便视之为“聚古今之精英，实治乱之龟鉴”（引见前文），推崇备至；欧阳修主编的《新唐书》不收四六，独录贽文十余篇。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录其疏至三十九篇，上下千年，所取无多于是者，经世之文，斯之谓矣”^③。从中昭示了别裁四六在宋人心目中的价值取向，因而其表现范围随之扩大，文体功能也随之增强，既可用以陈说时事，议论言志，又可用来吟咏情思，抒写性灵。

这种功能同样体现在表启中。茅坤说：“欧阳公之文，多遁逸可诵，而于表启间，则往往以忧谗畏讥之余，发为呜咽涕洟之词，怨而不诽，悲而不伤，尤觉有感动处。”又评《谢擅止散青苗钱放罪表》云：“摹写情神，点缀色泽，至于遭谗罹患处，更多呜咽累歔之思。”^④不仅如此，表中又议论实施青苗法时“分命出使之车，交驰于郡县；悉发旧藏之镪，取息于民氓”所带来的“众弊”；具有了议政功能；表末又云：“戒小人之饰非，希君子之改过，冀图薄效，少答鸿私。”^⑤则俨然以谢表为谏书了。欧阳修的大量表启表明，作者善于用四六表现政治际遇中润肌切骨的心灵感受，“摹写情神”；在“摹写情神”中，又往往伴以对政事的见解，议论说理，形成了抒情与说理并行，情与志互现的功能结构，垂范后来的四六创作。从创作主体观之，该功能结构的形成和盛行，与北宋古文运动的胜利及士人的政治际遇息息相关。

北宋古文运动取得胜利的标志之一，在于儒道的实践品格空前张扬与士人“救时行道”的精神全面形成，即所谓“自欧阳子出，天下争自濯磨，以通经学古为高，以救时行道为贤，以犯颜纳说为忠。长育成就，至嘉祐末，号称多士，欧阳子之功为多”^⑥。但自欧阳修以后，政坛变化多端，从北宋的庆历新政、新旧党争到南宋的和战之争、道学与反道学之争，风波迭起，政潮不断。接连不断的政海风潮，不断激发了士人“救时行道”的自觉精神，也不断给他们带来了“遭谗罹患”的政治命运。宋代士人特有的这种主体精神与际遇，决定了整个文学创作的基调，也使属于“告语门”的表启沐浴了“犯颜纳说”的议论言志之风，浸淫了政治际遇中的“呜咽累歔”之情。

① 《全宋文》第64册，第14—16页。

② 周必大《孙尚书鸿庆集序》，《全宋文》第230册，第149页。

③ 永瑤等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593页。

④ 高海夫等《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》，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1784页。

⑤ 《全宋文》第32册，第79—80页。

⑥ 苏轼《六一居士集叙》，《苏轼文集》卷一〇，第316页。

按照传统的文体分类法,表启与诏制均属“告语门”。诏制为上告下,表为下告上,启为同僚相告,三者都属于应用文体。所谓“四六骈俪,于文章家为至浅”,是就其应用性质而言的,但从其功能与价值观之,诚如谢伋所说“四六之艺,咸曰大矣”^①。这从前述汪藻《皇太后告天下手书》及其《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》等诏制可见一斑,大量的表启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。以表为例,王安石《手诏令视事谢表》及其《乞罢政事表》、《乞退表》、《乞宫观表》等,与欧阳修的表启一样,在议论时政中说理,在说理中言志,在言志中抒情,呈现了作者在政治生涯中特定的心路历程与情感世界。倘若将宋人别集中相关表文前后联系起来,作整体观察,其功能与价值更为明显。譬如:苏轼在元丰年间所作的《到黄州谢表》、《谢量移汝州表》、《乞常州居住表》,元祐年间所呈《谢中书舍人表》、《谢翰林学士表》、《杭州谢放罪表》、《知登州谢表》,绍述以后所写《英州谢上表》、《到惠州谢表》、《到昌化军谢表》、《移廉州谢上表》,等等,犹如一组既独立成章又一线贯穿的联章诗,贯穿了作者自神宗元丰以后升降沉浮的仕履,交织了在升降沉浮中“救时行道”的精神与“呜咽累歔”的情愫;同时又如一组大型史诗,记录了自元丰至哲宗“绍述”期间党同伐异的政海风潮,反映了该时期周期性反复动荡的政坛怪圈。他如“遭谗罹患”,历尽坎坷的苏辙、刘摯、范纯仁、李光、杨万里、周必大、朱熹等大批士人,他们在任职、贬谪与辞免时所作的一系列四六谢表,无不具有这种功能与价值。

胡松《唐宋元名表序》指出:“是学也,昉于汉魏六朝,盛于隋唐,而极于宋。彼其工拙繁简,骈俪直致。要之,其体不能尽同,然其意同,于宣上德而达下情,明己志而述物。”^②尤其是在宋代,伴随着“救时行道”的自觉精神全面形成,士人的参政主体空前凸显,又因政坛多变,常陷于政海风潮,升降交替,荣辱交织,所以在升迁与贬降、辞位与致仕时创作四六谢表,不仅是他们需要掌握的一门学问,而且是他们用来“达下情,明己志”的一种经常性方式,谢表也因此成了宋代士人直接反映政治诉求,表露情感世界的重要载体。综观宋人别集,四六文最多的是表与启,几乎家家有数卷,数量众多,名篇迭出,胡氏《唐宋元名表》所选,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作品就出自宋人之手。

需要说明的是,宋人别集中的表启应用范围十分广泛,或用于“岁时通候、仕宦迁除、吉凶庆吊”;或用于“庆贺,有辞免,有陈谢,有进书,有贡物。所用既殊,则其辞亦各异焉”^③。其功能与价值同样不局限于抒情言志或纪事存史。这进一步证明了曾为“一代之文学”的骈文到了宋代,虽失去了往日文坛的主流地位,但在士人多层面文化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,呈现出多种功能与价值。这些功能与价值虽根植于应用,却具有不可忽视的文体与文学史意义。进而言之,四六从“古体”的兴盛到“唐体”的再盛,再到“宋体”的形成,与诗史上从“唐音”的兴盛到“宋调”的再盛、词史上从宋词的兴盛到清词的中兴等文学现象,都表明了古代作家在面对“通行既久,染指遂多,自成习套”的旧文体时,固然“遁而作他体”^④,不断创造新的文体,推动文学的新变,但又不断加以改造,赋予新的生命力,继续发挥其功能与价值。对前者固应大书特书,就后者同样不可忽视,因为两者都以自身的功能与价值,共同谱写了中国古代文体与文学的发展历史。

[作者简介] 沈松勤,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教授。发表过专著《北宋党争与文人》等。

① 《〈四六谈麈〉自序》,《全宋文》第190册,第335页。

② 《唐宋元名表》卷首,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382册,第292页。

③ 《文章辨体汇选》卷一二五,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403册,第440页。

④ 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,第218页。